

周 恩 来

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

200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

周 恩 来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.75 印张 31,000 字
1979 年 5 月第 1 版 197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30,000

书号 3001·1705 定价 0.14 元

目 录

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..... 1

(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)

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
上的讲话 6

(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)

对在京的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作家的
讲话.....35

(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七日)

关于文化艺术工作 两条腿走路的问题^{*}

(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)

两条腿走路，就是对立面的统一。这个问题毛主席在《矛盾论》中早已解决了。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，既要有机地结合，也要有主导方面(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)。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，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。这本来是老问题了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我们一些同志常常强调这一方面，忘记那一方面，变成一条腿，而一条腿走路，难免就要摔跤。

在大跃进中，产生一些缺点，有些是可以避免的，有些是不可避免的。重要的是接受教训，继续跃进。

在文艺工作方面，一年来的成绩是主要的，是九个指头；缺点是次要的，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。

文化艺术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。既要结合，又有

^{*} 周总理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下午，邀约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，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，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了座谈会，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。

主导。

一、既要鼓足干劲，又要心情舒畅。去年大跃进，这是可喜的现象。但是过分紧张，就不能心情舒畅了。写东西不能天天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去催，精神搞得太紧张了，写不出好东西来。好作品的产生，可以是偶然得之，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，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。陈毅同志在参加宴会后写诗十章，说明心有所感，心情舒畅，写了好诗。我怎么不能偶然得之呢？没有长期修养也。希望大家精神松弛一下，就可能有好作品出现。当然，一定要鼓足干劲，但一定也要心情舒畅；鼓足干劲是主导的方面，但不要过分的紧张。在这个方面，文化部急了一些。这并不是给大家泄气，而是为了更好地跃进。戏剧、美术等作品，不一定都在十月一日前搞出来，十月底、年底搞出来也可以，只要是好作品。

二、既要力争完成，又要留有余地。工作任务的力争完成和留有余地要有机地结合起来。订任务的时候，不要订得太高、太紧，要留有余地，不要层层加码。订的指标要是高了，也可以低一些，退一步，若超额完成了，不是很好吗？主导方面是力争完成，留有余地是为了保证质量。任务订得低一些，超额完成，也很好，也不会浪费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精神食粮不能以数量作标准，所谓“卫星”，不能自封，要人家看了之后都说好，才能算是“卫星”。

三、既要有思想性，又要有艺术性。主导方面是思想性。不是不讲艺术性，思想性是要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。否则还叫什么艺术品。现在好多东西（特别是地方戏）单纯要求思想性，不讲艺术性，实际上，思想并没有通，艺术上搞得比较粗糙，地方戏的特点也没有了，使人看了很难过。今后对于艺术性，一定要要求得严格一些。

四、既要是浪漫主义，又要现实主义。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。就是说，既要有理想，又要是现实的。没有理想的艺术作品，干巴巴的，和照像一样。况且照像也还要有艺术性。主导方面是理想，是浪漫主义。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的生活更美，思想情操更崇高。现在的作品中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够，尤其是浪漫主义更差一些。毛主席就说过话剧在舞台上和生活一样，没看头。我看话剧也要有浪漫主义。

五、既要学习马列主义，又要和实际相结合；既要学习政治，又要和生活实践相结合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，时刻不能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脱离。学习马列主义不要干巴巴地学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，到处可以学到马列主义的真理。

六、既要有基本训练，又要有文艺修养。在业务上，首先要有基本训练，同时要有其它文艺修养。既要精通一行，又要有多方面修养，精通一行是主导方面，艺术家可贵的就是专一行。但演员的才能应该是多方面的，我

们的演员很少全才。特别是年轻的演员，更要努力学习。文艺修养是多方面的，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等等，都需要懂一点。譬如搞戏剧的也可以学学绘画，作作诗。当然不能一律都要求如此。但艺术修养多一些，总是好的。

七、既要政治挂帅，又要讲物质福利。在生活上，主导方面是政治挂帅，否则不能成为新时代的艺术家的，但同时要注意物质福利。对于工资、稿酬等问题，应该研究、总结。有些同志提出戏曲演员要减薪，减得和行政人员一样，这是不必要的。当然，过高的高薪也可以考虑。稿酬问题也是如此。对待成名作家，稿酬应与青年作家有所区别，稿酬应分成几等。因为其中还有个劳动保护精神。

八、既要重视劳动锻炼，又要保护身体健康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，是好的，尽管某些艺术也有部分体力劳动，但与工农业生产劳动是不同的。劳动锻炼不要一般化，年老多病的可以不劳动。要因事制宜，按照各行各业的特点作具体的规定。譬如，芭蕾舞演员由于参加不适当的体力劳动而不能跳芭蕾舞，这也是个损失。在文学艺术劳动上，也要注意保护演员、作家的身体健康。作家、画家在生病时，演员嗓子不好或女演员来例假的时候，有权利不接受演唱、写作任务，可以顶上来，可以把意见一直提到国务院。要教育群众爱护演员身体健康，繁重的演出不要老是“再来一次”。京剧的乐队也不要放在台前的乐池里，以免演员唱起来很吃力，台下观众还听不

到。这件事北京说通了，还要向外地剧团作说服工作。戏曲演出时要打字幕。这些事情，文化部要掌握起来，要负责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健康，可以发通知，下命令，改变这种情况。

九、既要敢想、敢说、敢做，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。客观的可能性要与主观的能动性结合起来。

十、既要有独特风格，又要能兼容并包（或叫丰富多采）。独特风格是主导的。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个性，譬如京剧，就有梅派、程派、谭派、麒派等区别。学人家的是为了丰富自己，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就会消亡。

总之，要从思想到工作方法，学会两条腿走路，以便作好我们的工作，同心同德，群策群力，推动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不断前进。

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

(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)

引 言

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，就是民主作风不够。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，破除迷信，敢想敢说敢做。现在却有好多的人不敢想、不敢说、不敢做。想，总还是想的，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，少了两个“敢”字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，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，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，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。但是，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想得、说得、做得偏了一些，是难免的，这并不要紧，只要允许批评自由，就可以得到对立面的统一。只许一人言，不许众人言，岂不成了“一言堂”么？“一言堂”从何而来？是和领导有关的，所以，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。我首先声明，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、讨论、批判、否定、肯定。“一言堂”，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，天下没有这种事情。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

的话，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，过火一些，这就要允许批评。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。奉劝作家同志，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。伟大的政治家、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。毛主席经常说，我们看马克思、列宁的著作，都是精心修改的。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，他写的东西都是几易其稿的。所以，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，我们所发表的意见，都允许大家讨论、商榷。

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，从今天水平来看，也不一定都是对的，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。使我难过的是，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，打入冷宫，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。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，我就谈一谈。心有所感，言之为快。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，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，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。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，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，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；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；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。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，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、商量，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？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。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，也允许提意见。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，允许提意见，加以修改，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？我们要造成风气。大家都是在社会主义立场的范围内探讨问题，是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，把文艺政

策执行好。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，为什么不能讨论呢？我今天的讲话，你们作了记录带回去，希望你们谈谈，把意见寄来。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“完全同意”、“完全拥护”、“指示正确”之类，我就不看。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，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。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，有提出商量的问题，就写信寄来。

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，要允许批评，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。象我今天的讲话，只有两天时间考虑，是不成熟的。当然，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、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，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。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，那就只是一个胎儿，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，能不能长大成人，现在还不知道。你们提出意见来，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。我们要学习毛主席。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，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，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。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，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。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、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学习毛主席，就要学习他这种作风。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，才能树立好风气。总之，要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允许有不同的意见，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，才有心情舒畅，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，又有纪律又有自由，又有统一意志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，那样一种政治局面。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，收到这样一种效果。

三年来，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，敢想敢说敢做，结果反而束缚思想。其实人家也还在想，只是不敢说不敢做。人又不是石头，哪有不思想的道理。现在我们要使人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。几年来有一种做法：别人的话说出来，就给套框子、抓辫子、挖根子、戴帽子、打棍子。首先是有个框子，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，不合的就不行。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，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、片面性、形而上学出发，也不经过调查，他主观上以为“右倾”，就断定是“右倾”。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，认为是“温情主义”，先立下这个框子，问题就来了，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。感谢上海的同志，你们建议我看《达吉和她的父亲》，我看了，小说和电影都看了，这是一个好作品。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，便说这是“人性论”。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，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，但没有流下来。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？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，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。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，我们激动得要哭，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，用手蒙住脸，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。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，我们要哭了，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，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！听说导演提心吊胆，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。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，而是说这里有框子，“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”，于是导演的

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。一切都套上“人性论”，不好。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。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里就说，没有抽象的人性，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。可是现在还在那里定框子，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，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，就给戴帽子，“人性论”、“人类之爱”、“温情主义”等等都戴上去了。先是抓辫子，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，从组织上打棍子，而这都是从主观上的框子出发的，是从定义出发的，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，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。还有挖根子。一是联系历史。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，都要联系历史检查，这叫人怎么办呢？二是联系家庭，挖出身的根子。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，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。所以，追根子，联系历史是可以的，但主要应当看今天的表现；联系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，但主要应当看本人。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，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，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，有毛病，这必须承认，但不能随便联系，主要是根据今天的表现、本人的表现去判断。先定一个框子，拿框子去套，接着是抓辫子、挖根子、戴帽子、打棍子，那就不好了。

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。我们有的是大框子，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。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，使之无产阶级化，这个框子该有多大！我们还要改造自然，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！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、最伟大的世界

观，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来比较，那些都渺小得很。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，揭示未来，我们有的才是最伟大的框子。把这个伟大的框子缩小成为形而上学、主观主义东西的小框子，是错误的。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，我们要抓大辫子，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，那种“白发三千丈”的辫子。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，他们猖狂进攻，反党反社会主义，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。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，上面已经分析过，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，但主要还是看本人、看今天。戴帽子，如果确是右派，就要戴帽子，只是不可乱戴。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，把一句话的错误、一种想法的错误，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、可以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，也都看成毒草、邪道，就不对了。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。即使他错了，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，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，不能随便开除党籍，那是不慎重的做法。我们还是要“一看二帮”嘛！所以，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，不抓辫子，不联系出身历史，应当戴的帽子也不戴，应当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那种错误的、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，一来就“五子登科”，这种风气不好。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，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、大辫子之类的问题。比如出身、历史，就应当向党交代，使大家知道，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。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，是

改不掉的，要靠众人帮助，扫帚不到，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。所以，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当坚持的。只有把那种坏的、不好的偏向去掉，正风才能建立起来。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，又有纪律又有自由，又有统一意志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，那样一种政治局面。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，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，提倡这一种正确的风气。

以上是开场白，是引言，下面讲六个问题，如果时间来得及，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。

一、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

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，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。搞得过了头，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，甚至损害更大。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，不能老去催作家，叫他赶写稿子。当然，有些稿子也要赶，例如报纸的社论，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，必须赶写，以便配合斗争。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，如果写得不好，宁肯晚一天见报，把它改好。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。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，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？搞指标、订计划、保证完成、一催再催，对于精神生产者苦恼的事。我说过，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，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。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，但提倡太过也不行。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，结果下面

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，其中就有粗制滥造、浪费劳动力、占用材料的，当然也有拍得好的。总之，要求得过多，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。多快好省，要算总帐，算大帐，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。比如张水华同志，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，应当允许慢一点，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。又如做诗，我们的领导人中，陈毅同志喜欢写诗，写得很快，是多产作家，是捷才。毛主席则不同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，写得较少，而气魄雄伟、诗意盎然。当然，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。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，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，叫他少写。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。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。国画，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《山河新貌》画展，就是很丰富的。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，虽然我是江苏人。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。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。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，而且要集中力量，求得搞出更好的东西来。这方面的问题应当讲清楚。过高的指标，过严的要求，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。

有的同志提出，在精神上、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，我支持这个意见。当然，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。例如，人家的意见是对的，你说他错了，批判了他，使人家的`心情很不舒畅，难道不应当检讨一下吗？又如献稿费问题，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得稿费，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，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，而且，即使

批准了，也不一定就合适。比如农村，农民手里的粮食，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、大队的储备粮，也可以出售一部分，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，这是他的劳动所得。当然，也要有不同对待，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，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，就要有所不同。业余时间写作所得，就不能无偿占有。据说有人说，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，不好退赔。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，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。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。所以还是应当退赔，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。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，为什么不应当退还给本人住呢？

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问题。过去搞得多了，不合乎巩固、提高的精神。文教队伍搞大了，事业搞多了，包括教育、文化等方面的问题，就应当同样执行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方针。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，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，加以约束。据说，有些地方、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。我看还要从实际情形出发，要区别情况，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，有的是领导的要求。群众自己爱好，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，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，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，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。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，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？当然，允许集体所有制的剧团，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，不能让班主、把头拿高薪。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，应该是主要演员、艺术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。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，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